

藏彝走廊研究丛书

主编：袁晓文

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

李绍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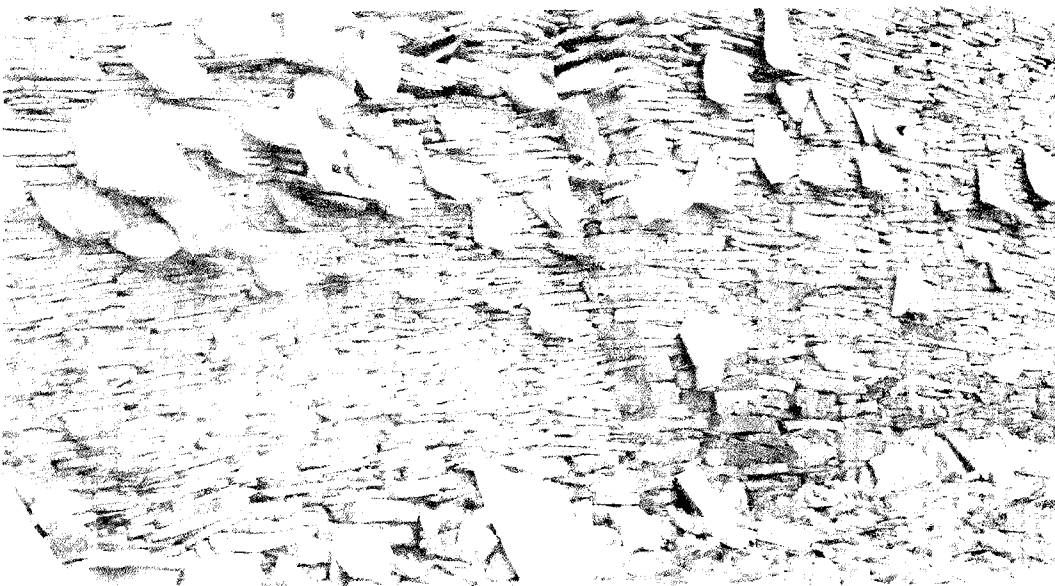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藏彝走廊研究丛书

主编：袁晓文

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

李绍明 著



民族出版社

总 序

一

民族学与民族史学术上的“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西藏、四川、云南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北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在横断山脉地区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由北而南的大河纵贯其间，故习惯上又称这片区域为“六江流域”。但它并非六江流域的全部，而主要指几条江的上游。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就行政区域而言，藏彝走廊主要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地。

在这片区域中，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等民族，而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从民族学而言称之为“藏彝走廊”。但在此一区域的南部，同时还居住着壮侗语族中的傣族和壮族、苗瑶语族中的苗族，乃至汉族、回族以及孟高棉语族中的一些族体。同时，这条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先民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

所。该走廊现今共有人口 1000 余万人，其中有 530 余万人是少数民族，其余的是汉族。

在这条走廊重峦叠嶂、河谷深邃的群山峡谷中，不仅居住着若干少数民族，而且至今还保存着即将消失的被某一民族语言淹没的许多基层语言，同时还积淀着许多至今还起作用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保留在他们的信仰、文艺、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从石器时代起直至现在，众多民族都在此留下了自己活动的实物证据，其内容之丰富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这些宝贵资料，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我国西南地区乃至中南半岛各民族的起源与迁徙、融和与分化，以及各民族的历史、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均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而这一研究同时对于我国边防的巩固、边区的开发、民族团结的增进和实现当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亦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关于藏彝走廊研究，费孝通生前曾经作过五次阐述，是他为我国学术界留下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第一次，是 1978 年 9 月，费孝通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的一次会议上，以《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为题的发言中，首先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问题。他指出：“要解决（民族识别）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至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接着，他指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把这走

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连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他还指出：“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渝。”^①

第二次，是1981年12月，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以《民族社会学的尝试》为题的讲话中，再次论及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性并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民族走廊学说。他说：“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西陲的这个走廊。历史上系属不同的集团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正处在汉藏之间。这几个大民族在这地区你去我来、我去你来搞了几千年。来回的历史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冲积和沉砂。所以，我在前几年曾经指出过，这是一个极值得研究的地区。”此中费先生所说藏彝走廊中历史上系属不同集团建立的强大政治势力，当主要指自唐代以来政治势力覆盖该走廊的吐蕃、南诏和大理等几大政权。这些政权在历史上都曾一度影响到整个中国发展的进程。费先生又接着指出：“最近听说西南几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攻关，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是很好的。”费先生还指出：“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②费老对中华民族分布格局勾画出的板块与走廊，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均具有重

①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

②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的尝试》，见《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而对其研究则涉及民族学、民族史、民族关系等诸多学科的内容。为此，必须进行民族学科及其他社会学科的综合研究。

第三次，是1982年4月，费孝通在昆明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以《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为题的讲话中，着重就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讲述了意见。他说：“1978年那次讲话我提出民族研究要提高一步，怎样才能提高呢？我觉得今后需要进行宏观的研究，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况和趋势，不要仅限于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的研究。今后中国的民族还是要变的，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变化的方面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民族之间关系是怎么样呢？他本身规律怎么样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他接着说：“根据我们三十多年的经验，需要重新考虑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搞。现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六个省、区的有关同志对岷江、大渡河、怒江、澜沧江、雅砻江、金沙江这六江流域的民族进行考察，这是很好的。好就好在，第一条它打破了行政上的界限，第二条它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进行综合研究。”他再次鼓励和要求大家：“我们不要一个虚名，不要人家拍手，不要搞得热闹，要扎实地工作。现在的名声比我们实在做的超过很多，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去做，慢一点不要紧，不要急躁，不要踏空。”^①

第四次，是1982年5月，费先生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以《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为题的讲话中，再一次深入地阐述了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的理论问题，他说：“那个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渝地区。珞渝地区的民族构成，外国人搞不清楚。这里发现有水田

^① 载《民族学报》（昆明），1982（2）。

技术很高的阿帕达尼。他们从哪里来的呢？我从照片上看，他们头上也有一个髻，同彝族的‘英雄髻’很相似。语言我们还不清楚，没有材料作比较研究。再下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部的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相似类型的民族，看来都是这条走廊里的民族，都在藏族和彝族之间的地区里。藏族是以拉萨为中心，慢慢扩大的。……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我是在1979年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四川、昆明的同志准备开始研究这些问题了，西藏也参加了。调查的地区称作六江流域，就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等六条江；从甘肃下来一直到云南怒江、西藏的珞渝地区。这就不是一个省，而是几个省几个自治地方联合调查了。这个计划，领导上很支持，说很好。但是不那么容易，要做很多工作。……以上讲的，是西南的那一条走廊。”接着他说：“另外一条是中南的走廊。”当他在分析了这条走廊中的苗瑶、壮侗语族复杂的情况后提出：“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这里各种民族有其特点。山区民族就同傣语系各族不一样，今后的发展问题也不同样。”他继续谈到：“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语，有的讲突厥语，也是很复杂的，不容易处理。有些民族讲两种语言。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看来，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①

^①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第五次，是2003年11月6—8日，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联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费老当时患病在身，他特为会议发来贺信，再次阐述了藏彝走廊研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意义。他在这封贺信中说：“听说11月上旬将召开‘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我特别高兴。我是‘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人之一。二十多年前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与我当时对自己的民族研究经历的反思是分不开的。‘藏彝走廊’上频繁而密切的族间交往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早已引起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界的注意，我自己在民族调查研究中初步看到，中国存在几个这样的‘民族走廊’，而‘藏彝走廊’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民族种类的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密切接触和交融。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他又说：“前些年，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针对世界格局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说法。‘文化自觉’，指的是认识和处理文化关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追求的境界是文化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展望新世纪的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研究，我们能看到这些学科所承担的，正是‘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在‘藏彝走廊’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最后他说：“我很高兴地看到西南地区的同事们对于这个问题给予关注，更希望看到在‘藏彝走廊’上开展跨学科研究，从深化我们对这条走廊认识的侧面，对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

自己的贡献。”^①

费老对藏彝走廊的第五次公开阐述，可说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这一问题的表达。他在此明确说明了深入研究民族走廊正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问题。

费先生对藏彝走廊及其相关的问题论述，反复提出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其目的即在于更好的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而这一理念既整合了中华民族，又尊重了各民族个体。这对于国家的巩固和民族的团结都极为关键。因此，它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藏彝走廊这一概念虽然是由费孝通先生正式提出的，但在此之前早已引起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注意，比如我国著名学者章太炎、方国瑜、陶云逵、任乃强等先生均对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流动进行了一些研究。此中陶云逵先生即对怒江、澜沧江流域的走廊特点作出了精辟的阐述。1939年，他在《碧落雪山之栗粟族》一文中说：“怒江、澜沧江，对于东往西，或西往东的交通上是一种阻碍，但是自北往南，或自南往北未尝不是一条天成的大道，因为虽然不能行舟，但是沿河而行的便利是很诱人的，设如我们很笼统地叙述夹着这两条河的山脉形式和方向，则高黎贡山、碧落雪山以及云岭雪山三者山脉，也多是自北而南的。这种形式，在交通方向上的便利与阻碍，和前述的河流是一样，就是便于南北，而碍于东西。”^② 而在外国学者中，有如法国藏学家 R. A. Stein（石泰安）不

① 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② 陶云逵：《碧落雪山之栗粟族》，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仅有“汉藏走廊”的提法，而且还有专著《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①的问世。以上这些论著均为藏彝走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自1978年费先生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在全国学术界，尤其是在西南民族研究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0年，西南民族研究界筹组建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其目的之一在于打破省区界限，进行完整的、综合的民族调查研究。1981年11月，在昆明召开的川、藏、滇、黔、桂、京等省区市学者参加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中，与会同仁一致认为应组织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学者在内的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逐步对藏彝走廊即六江流域进行实地的深入考察。

为了推动藏彝走廊民族综合考察的实施，1982年3月15日，我国知名学者和有关省区领导16人（按姓氏笔划为序）：马曜、尹达、方国瑜、牙含章、多吉才旦、任继愈、孙自强、林耀华、杨汉光、秋浦、夏鼐、徐中舒、翁独健、费孝通、傅懋勤、梁新华，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胡乔木、杨静仁、江平、梅益、宦乡等书面建议，尽快开展这一工作。当即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使得此次民族综合考察工作能够及时展开。1982年4月，费先生来到昆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亲自对即将开展的民族考察工作予以指导，并在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以《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为题的学术讲演。

在费先生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任会长马曜先生以及老一辈学者和有关领导的关怀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2年5月在昆明正式建立。确定由学会秘书长李绍明任考察队队长，学会副秘书长童恩正（四川）、何耀华（云南）任考察队副队长。考察队首先确定以雅砻江流域和怒江中游这两处为科学考察的试点区域。考察区域内的民族主要为藏、

① [法] R. A. Stein（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彝、傈僳、纳西、傣、独龙、苗、珞巴等民族和僮人。考察的重点为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习俗、宗教及民族关系等问题。参加考察队的有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和上海等省市区有关单位的人员共七十余人，分属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当考察队组成并分赴雅砻江与怒江流域考察时，费先生又于1982年5月在武汉发表了《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的讲话，再次对藏彝走廊的考察予以指导和支持。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两处试点工作，在经过3~5个月后，基本告一段落，形成了3本考察报告，即李绍明、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蔡家麒、杨毓襄编的《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和《滇藏高原考察报告》，均相继于1983—1984年内部出版。1984年7—9月，考察队又组织十余人对雅砻江上游民族地区作了综合考察，最终形成由李绍明、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并于1985年内部出版。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对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除了综合的民族考察之外，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倡导和组织下主要还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一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亦称南方丝绸之路，从我国成都出发经四川西南、云南以及缅甸、印度、中亚直至欧洲。这条道路在国内所经很大一部分在藏彝走廊地区，沿途均为少数民族。以往在我国学术界对这条道路并未取得共识。经过调查研究主要形成如下成果：伍加伦、江玉祥主编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① 南方丝绸之路编委会编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②

① 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1990年和1995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编委会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①。此外，1990年初，川滇两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14家文博考古单位联合举办了“南方丝绸之路文物摄影艺术展览”，并在川滇许多重要城市进行了巡回展出；1990年8月，由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主办召开了“西南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协助川滇两省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南方丝绸之路》40集系列电视片。在此带动下，西南丝绸之路的调研在各地相继开展。经过几年努力，这一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而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并形成了今日重振西南丝绸之路的社会共识。

二是藏彝走廊各民族的语言研究。藏彝走廊各民族语言极其复杂，一种民族讲多种语言和多种民族讲同一语言的情况广泛存在，尤其是一些被称为“地脚话”的民族语言处于底层，往往为通用的语言所掩盖。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组织民族语言学者对一些濒危的小语种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引起了国内外学人的充分重视。

三是藏彝走廊的诸多专题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为应用研究，因而藏彝走廊的总体或综合的基础研究势头有所薄弱，但关于这条走廊的各项专题研究却异军突起，其成就相当突出。比如四川学术界的康巴文化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禹羌文化研究、岷江上游考古发掘与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西藏牵头的茶马古道研究、昌都地区研究；云南学术界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三江并流区域自然与文化研究、卡瓦格博雪山区域生态与人文研究等等，都具有代表性，而其成果均为学术界所瞩目。

近几年来，西南学术界为再次重振藏彝走廊的基础研究作了一

^①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些工作,发表一批科研成果,并于2003年11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这是自费孝通先生25年前提出这一概念,中国西南民族学会21年前组织六江流域的民族综合考察以来,对藏彝走廊研究所作的第三次重大举措,也是聚集国内学者对藏彝走廊问题的首次学术探讨。这次会议研讨的成果已集结为《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文集正式出版。2005年8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足见藏彝走廊的研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与认同。2005年10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在平武县召开了“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族群互动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同名论文集。2006年3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开展了藏彝走廊中攀枝花社区的20年追踪调查。2006年6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会与台湾学者召开了“海峡两岸民族学学术研讨会”。2006年6月,四川、云南民族学界和台湾中研院合作开展了藏彝走廊考察。2006年7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在汶川县召开了“羌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10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平武县人民政府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与区域文化研讨会”。目前,新一轮的藏彝走廊学术研究正在认真、踏实地逐步开展。藏彝走廊研究的项目与问题,今后都将从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

四

藏彝走廊的研究,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第一,走廊理论问题

藏彝走廊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费先生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民族研究没有打破省区界限,没有形成多

学科的综合研究，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费先生五次提出藏彝走廊研究，每一次的着重点都不尽相同，直到2003年，才最终确定藏彝走廊这个学术概念的目标就是为了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我们研究走廊学说，梳理其思路的发展，对于中国的民族学，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后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必须是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这样才能维护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为此，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打破地区、学科的界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费先生提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的民族格局，其中六大板块是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三大走廊是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板块是用走廊联结的。在这个民族格局的框架中，涉及民族学、民族史、民族关系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内容。而走廊学说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构成，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以及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都是关键。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

我们探讨这个理论问题虽然已近三十年，但理论的探讨与发展均感不足。费先生希望我们来发展这个理论。这是一个纲领性的问题。

第二，走廊的范围问题

藏彝走廊的范围，大家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其中，关系最紧密的是对横断山脉、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和藏彝走廊三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有不同的理解。

实际上，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和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重合，但却是不同的概念，是不同但关联度很大的概念，因为六江流域是藏彝走廊的主要区域。

横断山脉也不是全部在藏彝走廊中。比如，有的研究者指出该走廊的北缘应该包括青海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东南是否到滇东北大关河流域？东缘是否应该包括龙门山脉？南缘止

于何处？是否只到大理州北部等等都没有定见。

同样，藏彝走廊并不是仅指藏彝两个语族的民族，有一些苗瑶、壮侗及其他语族的民族也在这里活动。而藏彝两个语族的民族也绝非仅在走廊中，有许多超出了这个领域，这又如何说明其联系与区别。

总之，藏彝走廊的范围有多大，与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的关系是怎样的，都还应该深入讨论。

第三，考古学的问题

藏彝走廊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得很不够。现在岷江、大渡河流域的遗址情况大体上是比较清楚的，而雅砻江、金沙江流域也有一些发掘，但远远不够。至于澜沧江、怒江流域就更少了。

走廊中的考古学研究也做得不充分，仅岷江、大渡河流域较为突出。问题在于缺环甚多，不成系统。如距今 5000 年的茂县营盘山遗址与汶川姜维城遗址、丹巴中路遗址、汉源狮子山遗址都出土有西北马家窑文化彩陶，应为同一文化传播。昌都卡若遗址亦有彩陶，也有受此影响的痕迹，但其他地方尚不清楚。比如马家窑文化究竟有没有进入成都平原？与成都平原的文化是什么关系？卡若文化有马家窑文化影响，但与其他马家窑文化遗址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清楚。

还有，藏彝走廊中多处有石棺葬发现，以岷江上游最多，延续的时间最长。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但这些文化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岷江上游的都没有弄清楚，何况还有其他流域。因此，对它的族属确定也就很困难。

第四，民族史问题

对走廊古代民族的族属有不同认识。学术界一般认为，藏彝走廊主要与古代氐、羌、戎有关，有的学者认为不一定。有人认为除了氐羌系外，还有夷系的民族（并非现在彝语支民族先民）、还有

胡系的民族。这些新的观点非常可贵，值得深入研究，才能确定夷系是什么民族，胡系是什么民族。现在看来，这个走廊中历史上还有苗瑶、壮侗语系的一些民族活动，都值得深入探讨。这些民族如何互动则是另一重要课题。

对走廊中藏缅语族各语支民族，一般均认为来源于西北，但也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他们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都有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彝族的先民就是当地的土著，与古羌没有关系等，但“土著”的界限如何划分也是一个问题。

第五，民族语言问题

学术界对汉藏语系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不存在汉藏语系。在承认汉藏语系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不应该包括壮侗、彝缅语族，认为这两个语族与汉藏语系相差甚远，应该是单独的语系。

对小语种的不同认识。对藏彝走廊中的众多小语种，学术界的看法差距更大。比如嘉戎语是藏语支还是羌语支？纳木依语究竟是羌语支还是彝语支等。由于一些小语种没有系统地调查，系属很难划分。

语言的研究影响到民族史的研究。语言相同或相近的民族在历史上一定有很多的联系，经历过或分或合的历史进程。必须与民族史的研究密切配合方能奏效。

第六，民族文化问题

民族文化指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走廊中各民族有丰富璀璨的文化，既各有特点，又相互影响。现在我们对这条走廊研究不够，走廊中民族均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著作，有的只是支离破碎的记述，难以对走廊中的民族文化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文化比较研究。比如走婚文化，尽管今天的泸沽湖和扎坝地区都有，但这些文化之间有什么关系？与唐代东女国文化有什么关系？都还没有好好研究。再如，本波文化、碉楼文化等也

如此。碉楼文化从岷江上游开始，到西藏西部都有，是不是一样的文化？小亚细亚也有，也是一样的吗？因为没有详细的民族志，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难以深入。

走廊中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其中原始宗教的遗存很多。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之间也相互影响。但我们对各民族原始宗教，尤其是比较研究很不够。如，本波教和东巴教的创始人竟是一人，这到底是谁影响了谁？纳西族和嘉绒藏族各执一词，也需要深入的研究。

羌、藏两个语支的各民族间文化的联系较密切，而彝语支的各民族与之距离较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没有深入研究。

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调适，应该加紧进行研究。最近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走廊中加速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太大，怎样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结合起来，需要认真探讨。

第七，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近年来才引起充分重视，虽然已经起步了，研究得还是不够，尤其是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如何影响各民族的生计选择，在新的时期，生态变化怎样改变传统经济，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如何影响传统社会，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态观，也有各自一套保护生态的做法，或可称为生态民族学。这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应引入藏彝走廊加以研究。

第八，民族经济与发展问题

以前从区域经济出发的应用研究较多，而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民族经济的发展则较差。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问題，应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更应从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民族振兴的视角进行民族经济的针对性研究。